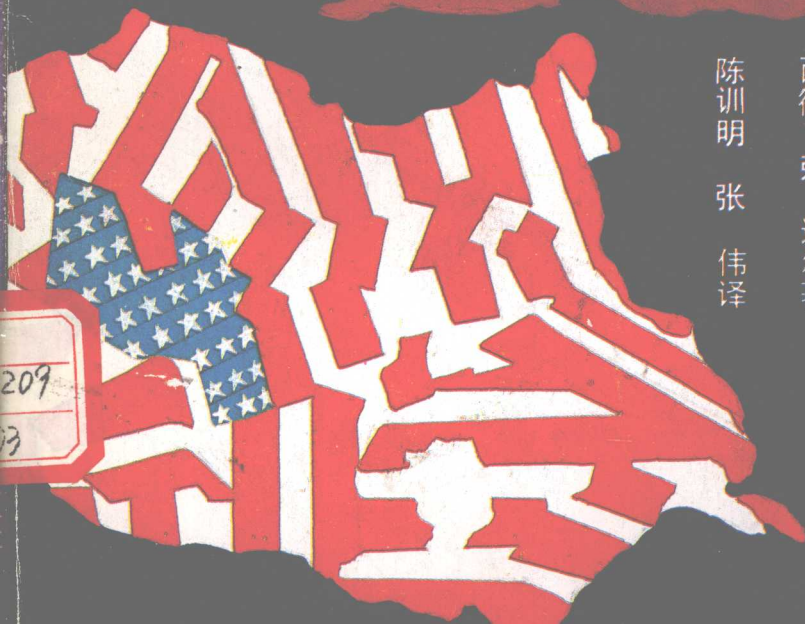


# 一个寻找 自由者 的回忆

〔西德〕弗·迈尔著

陈训明 张 伟译



# 一个寻找自由者的回忆

〔联邦德国〕弗·迈尔著  
陈训明 张伟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ФРЕДЕРИК МАЙЕР**

**ЭТОТ  
БЕЗУМНЫЙ,  
БЕЗУМНЫЙ  
МИР...**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искать свободу**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一个寻找自由者的回忆**

**〔联邦德国〕弗·迈尔 著**

**陈训明 张伟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88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1-01939-8/D·38 定价：1.60元**

## 引 言

我在美国住了30多年。我在那里念过书，在加利福利亚州雷德伦茨的一所大学长期执教，当过民主研究中心的顾问，该中心的任务是分析各种国际问题，为各种讨论会作准备。

在这些年当中，我见过美国的许多百万富翁、电影明星、政治活动家和大学者。这使我得以看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而这是其他欧洲人所难以办到的。在美国的最后几年中，我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因为我常常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多次被授予国际奖金。我在那里出版的哲学和教育学方面的书发行量很大，不仅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还作为美国一些高等院校的教材。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在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毫无疑问，当时有不少人羡慕我，因为我摆脱了为生活而奔波的烦恼。不过，当我今天回顾这几十年的生活历程时，应当承认，我是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在哲学和教育学方面所坚持的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对社会关系进行评价时也是如此。

30多年中，我的工作重点是错误的。我不理解教育领域中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这一活动如同镜子一样会反映社会

关系的状态。数十年中，我对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视而不见。这是由于我主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学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与我无关。

当时，美国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称赞我的“理想主义”。现在我才明白，我躲进“纯科学”，只不过是為了逃避具体的责任。理想主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立场：能当一个只为科学而工作的学者，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既用不着攻击别人，也不必同谁争论。然而这种理想主义乃是对于人类的巨大危险，因为只考虑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人，会把人从自己的视野中排除出去。在这30年中，客观地说，我的言行有助于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更加尊重关于美国社会秩序的极其虚妄的观念，因为我作为一个陶醉于自己理论的典型的美国学者，不可能想到要牺牲自己的专业去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

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部分生命白白耗费了，因为我曾经说谎而不自觉。让虚假价值眩目的光辉迷惑了自己，不懂得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早就成了真正的人道信念和观点的威胁。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千百万人失去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不得不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苟且偷生，对于他们能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认识美国。这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机会的国度，而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少数过寄生生活的人和广大劳动者或失业者形成非常尖锐的对比的国家。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对比都十分突出。

从纽约金融巨头优美的别墅、跨国康采恩、大银行和保

险公司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只消乘一刻钟的地铁，便可以到达贫民窟：这里的景况不禁令人想起德国战后被炸成废墟的那些城市。人们很难相信，这两个世界竟然属于同一个社会：一个街区里，住的是大财阀，他们迫使另一半世界服从自己的权力；而住在几公里之外的数百万人，则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当中有40万波多黎各人。

经过多年的思索，我才意识到，美国统治阶级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感；不仅没有责任感，他们还在一切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反社会的、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敌对的立场。希望读者明白，我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观点的，我曾经历过一个痛苦而又矛盾过程。实际上，谁愿意轻易承认他到今天以前一直坚持的观点是荒谬的，他受到了可怕的、破坏性的伪科学的影响并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呢？这里所谓的“别人”，是指那些把美国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推崇为自由和人道主义体现的人。

在这本书里，我将试图提供美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因为我现在坚信，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真正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手段散布的所谓“上帝的乐土”的假象。在我一生中的30年间，我认识了美国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我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仿效“美国理想”的做法是失策的，将会带来灾难性的恶果。

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克服使我们的生活美国化的危险。我相信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 目 录

## 引 言

- |                      |       |
|----------------------|-------|
| 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吗? .....   | (1)   |
| 为了取得成功, 不惜一切代价 ..... | (10)  |
| 一个国家, 两个民族 .....     | (21)  |
| 暴力事件急剧增加 .....       | (35)  |
| 没有活命的机会 .....        | (49)  |
| “你以为只是一个人倒霉吗?” ..... | (56)  |
| 在人世的荒漠中 .....        | (66)  |
| 种族灭绝政策 .....         | (79)  |
| 美国式的贫困 .....         | (92)  |
| 反动的团伙 .....          | (103) |
| 贪赃枉法的信条 .....        | (112) |
| 蒙骗大众的体系 .....        | (121) |
| 译后记 .....            | (130) |

## 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吗？

1936年，在将我载往美国的轮船上，我痛感孤独。我刚满15岁，父母留在德国，而我独自一人远涉重洋。甲板上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船舱里又热又闷。在这次长达五天五夜的航行中，我为同亲人的离别而感到难受，并因晕船而痛苦不堪。

不过，我毕竟还是有值得高兴的理由。谁在少年时代不想一个人独立自主地到远方去旅游！除此之外，对我来说，这还意味着摆脱我已经亲身体会到的纳粹分子制造的恐怖，去认识一个新的国度——我当时认为：在那里，无论人们属于什么民族，什么人种，都不会受到迫害；在那里，一切都非常宏伟，人们都富裕得不得了。

我出身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里。纳粹掌权以前，我父亲是德累斯顿银行哈瑙分行的行长。母亲和亲属们都很少说到钱，因为他们从不缺钱花。我们家的住房很宽，而且是在很好的街区，家里的东西很多。这在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人家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我在家里却常常感到烦闷。因为这是一种封闭性的生活，成天尽讲些索然无味的话。现在回想这些年代，我觉得自己在保姆家里过得最舒服。我经常到她的父母那里去



作客，觉得她家的东西非常好吃，虽然我小时候胃口很不好，而这家人又只能做一些非常普通、非常便宜的东西。他们很穷，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床。保姆的两个哥哥都没有工作，只能领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失业津贴。可家里的气氛总是十分和睦和欢悦。而且（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个星期天她的哥哥们去踢足球时，都要带我去。

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我们的社会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些人过着无比奢侈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不知怎样才能养活自己的子女。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相信，我最初的社会意识正是在这些岁月里萌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早在这之前，我便已开始理解我们社会的结构，然而毫无疑问，此时我心中已经产生了暂时还不那么确定的不公正感受：一些人绝对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另一些人则连最必需的东西都缺少。

当时，德国的失业人数达到数百万。由于企业间的残酷竞争和由此而系统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制度，使上百万男人被扔到大街上，于是成年妇女和大姑娘们纷纷被辞退，理由是她们应将自己的工作岗位让给男人。据说，在危机期间，她们若有职业和工作，那未免太奢侈了。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许多家庭陷入贫困，劳动市场上挤满了由绝望的人们所排成的长队。他们唯一所有的这一双手，什么人也不需要。他们被看作等待施舍的乞丐。有些人以酒消愁成了醉鬼（他们为数不少），而另一些人则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性命。然而，数百万失业的劳动者明白，失业并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于是他们进行了反抗。

我清楚地记得失业者在银行广场上举行的一次大游行

(是我保姆的父母领我到那里去的),到处红旗招展,十分壮观。正当一个人开始演讲时,警察包围了游行队伍。军官命令停止游行,聚集在那儿的群众不听他的,于是警察冲进游行队伍,凶狠地殴打他们,对倒在地上的人也不放过。我亲眼看到,警察们用皮靴使劲踩一个青年男子。我气愤而又痛心,不明白警察的行为为什么如此残暴。过了很久,即我到了美国之后,由于又多次看到警察的类似行为,我才明白,如此残忍地对待罢工和游行示威者和少数民族,总而言之,对待工人阶级,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经常企图用来维护他们所需要的秩序的手段。

由于经常接触工人和失业者,我很早就对这些人产生同情情感。我常常邀请出身穷苦家庭的同学来作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我在保姆家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的反应。这绝不是有钱人家里经常见到的那种做给人看的慈善行为,而是一个男孩子对于周围环境中他所不理解的不人道现象的反应。我感到,我不能独自过这种优裕的生活,而应当与失去这些特权的同学分享某些东西。

在自己成长、发育的这一阶段,我体验到一种对富人的鄙视感,认为他们是强盗。然而,到美国之后,我感受到的是对统治阶级的称颂,那里比中欧国家更喜欢把有钱人看作是值得大家百般模仿的榜样和典范。而且,在那儿很难不接受经过精心炮制而又广为传播的一种神话的影响:财富能带来一切生活的欢乐和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关系。

在这些岁月中,我形成了对于劳动者和失业者的好感。在这方面,我母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她是一个善良而又乐于助人的女性,不仅允许我同保姆一家保持接触——在我们

家的圈子中，这是很不寻常的，而且热情、诚恳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和穷人。

不过我对父亲的柔情和爱却不能达到对母亲的程度。他为人勤恳，但性情忧郁。对于他来说，人道乃是他作为政治家所运用的抽象概念。他对于社会现实的评价远远不是公正的，我很早就感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把他对于社会关系体系的观念与我在同保姆的一家结识期间得以亲眼看到的一切进行了对比。

正如我现在非常清楚的那样，学校与实际的社会关系也极少共同之处。老师向我们提供的现实形象是被歪曲了的。当时他们大谈德国如何伟大，如何优越，向我们的大脑中所灌输的思想是：要不是昧良心的变节者和共产党人在后方的叛变行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本来是不会战败的。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明白，基本上为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党员控制的教育，只能导致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向我们讲授的是被歪曲的历史，向我们描绘的是虚假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图景。总的来看，对我们所实施的，是跟士官学校一样的军国主义教育。

你们知道，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格卢斯老师》曾被改编为电影，由马伦·狄特里赫与艾米莉亚·杨林格斯主演。这部小说中塑造的那种典型的暴君式老师，在中小学时代曾使我吃够了苦头。

“没有哪个银行家、哪个帝王有格卢斯老师的权力大，也没有谁对现存秩序的稳固性像他那么感兴趣。他为维护当权者的一切权力而斗争，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猖狂地反对工人

……他在同那些比他本人更胆小的年轻教师谈话时，煞有介事地警告他们，务必防止动摇社会基础的现代精神的一切影响。他希望，影响巨大的教会、所向无敌的军刀、无条件的服从、无法破坏的传统……等等社会的基础，千秋百代，永世长存。然而作为一个暴君，他知道如何使人们服从他，如何使魔鬼和敌人听话；而他所谓的魔鬼和敌人，是指五万个使他伤透脑筋的调皮学生。”

我的老师中，只有德语老师不属于这一范畴。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大胖子，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成天板着脸，而是和蔼可亲，努力教育我们用批判的态度来思考问题。

当我们长大成人，回忆起我们的学生时代时，我们的记忆中往往会浮现出那些特别严厉、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惩罚来树立自己权威的老师。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忘记了当时在他们面前所感到的恐惧；或许还因为我们自己也认为，只有靠纪律和死记硬背的帮助，才能掌握一定的知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忘记，这种学校教育体制如同会毁灭敏感的教师一样，也会毁了敏感的学生。因为它忽略了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发展和加强年轻人与他人的团结感，激发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活跃兴趣，而绝不是让学生变成绝对服从、无条件执行任何命令的人。

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知识、讲道德的人往往碰壁，因为他们不压制别人。我长期担心，贬低人的尊严，使之变成意志薄弱、日益退化的生物的中小学教育体制，会为军国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功创造条件。

我小时候，学校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恐惧感。后来，我常常抱着这样的希望，总有一天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体制。在教

育过程中，儿童的感受力不仅不再受压抑，而且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当其成年之后，他将能够同其他人一起认识世界，使它变得更加完美。

纳粹掌权之前我在学校和整个学习条件下所接触的现实，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性情十分孤癖，我完全埋头在书本的世界中。我在阅读过程中所体会到的那种巨大的、近乎肉体的享受，使我产生新奇之感。课本枯燥无味，然而当我读到卡尔·迈耶的作品时，往往激动得脸发烧。的确，要想从他那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幻想世界中摆脱出来，是得花很大力气的。

同似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文学世界的接触，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的岁月里，我对严肃文学更加着迷。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萌发了对于哲学和文学著作的兴趣。它在我的后半生中打下了烙印。我一刻也离不开书，我总是要把书从头读到尾，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倘若不把书中的“液汁”吸干，我是不会把它放到一边去的。

1933年1月30日，即在反动的军人集团、大庄园主和大企业主让纳粹党上台那天，我正和朋友们在公园里踢足球。天阴沉沉的。我们老是担心在林荫道走来走去的看守人会把我们赶走，把我们的球拿去。我玩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回家去。在家里听到广播中说兴登堡<sup>①</sup>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我父亲说，这不会持续多久，人们很快又会组织新政府，这段“希特勒插曲”将被大家忘记。然而新政府并没有成立。

才过几天，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就开始在大街上操

---

<sup>①</sup>兴登堡（1847—1934），1925—1934年任德国总统。1933年1月30日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将政权交给了法西斯分子。

练。现在应当承认，当时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现出自己是胜利者。我站在人行道上望着他们，惶恐不安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为什么不去分享他们胜利的狂热？

可是过了几个月，这种感受就变成了恐怖。我看到纳粹分子如何搜捕共产党员，捣毁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不久，我自己便遭到一伙“小希特勒分子”的进攻。我家不得不迁居法兰克福，因为我父亲所在的银行清洗“非伊利安人”。德国银行中的纳粹分子不愿意他们的行长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犹太人是靠掠夺“人民财产”发财致富的“人民公敌”。父亲被迫退休，这对我们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再也不能保持哈瑙时期的那种生活方式了。

后来，弄到我连街都不敢上。孩子们也被禁止同我踢足球，我感到非常孤独。我的脑子里多次冒出自杀的念头。我现在才知道许多人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的父亲也曾自杀，但被救活了。

那个时候，我自然不可能明白导致我目睹的事件的全部原因，不过当时我即已开始憎恨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体现了对于一切人性的东西的蔑视。不义被说成是正义，谎言被宣称为真理。愚弄大众的机器开足了马力，鼓动人们去迫害“内部敌人”（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和“外部敌人”（法国和苏联）。

终于有一天，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决定让我到美国去。起初，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的观念中，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度，在那里，谁都可以从一个洗碗工变成百万富翁。而且，在我孩子气的思想中，美国是一个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国

家，充满了冒险和自由。

我对于自己将作一次长途旅行感到很高兴。当然，由于父母不能同我一起去，我又十分忧伤。然而当离别之日到来时，我的高兴劲顿时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是否会再看到我的双亲。我觉得自己是在同他们诀别，因而在法兰克福车站上同他们告别时，我心中非常沉重和痛苦。

不久之后，我即孤身一人站在巨轮的甲板上。暴风雨来了，晕船更加深了我的痛苦。此时我又想，倒不如不活下去的好。

经过漫长如年的几天几夜，终于看到自由女神的塑像时，我心中的那种欢欣劲，真是没法形容。艰难的航程结束了，我关于自由的一切想法都同这座象征性的塑像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里根总统曾宣称，美国是整个世界的“自由灯塔”。当我听到这句话时，不禁回想起我手扶着栏杆，从轮船甲板上观看自由女神像的情景。当时，我感到非常轻松，因为我想：现在你所来到的这个国家，将不会因为你的“非伊利安”出身而把你开除出足球队；现在你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不会在街上操练，也不会有“小希特勒分子”来威胁你。

我不仅对过上美好的生活满怀希望，还对纽约的街道和房屋的宏大惊奇不已。除此之外，还在码头上，我就已注意到了那种令人振奋的讲求效率的精神——直到今天，这也是美国的特点：我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人们不是在走路，而是被某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推动着向前跑，深信不疑地奔向我所看不见的目标。

纽约的亲戚接我到他们家去。我发现，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到背街的一幢房子跟前。他们不是让我从正门，而是从昏暗的侧门进家。显然，这是免得我看到住在这里的人是多么富裕。对我的接待相当冷淡，明白地希望我尽快离开。

我在纽约没有呆多久，因为早已为我穿越整个美国到洛杉矶去作好了一切准备。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安排在儿童寄宿学校里学习。



## 为了取得成功，不惜一切代价

美国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是以一种精心炮制的巧妙的体系为基础的。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青少年对于统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行为的绝对正确性深信不疑。不仅根本不培养每个人对于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社会责任感，反而千方百计地鼓吹和加深极端的个人主义，造成绝对的冷漠感，使青少年从小就无视需要帮助和支持的弱者的迫切要求。

我所住的那幢房子，表面看起来很不错，使人产生舒服的感觉。我们还有自己的网球场，每天早上上学有车送。然而寝室里却是又暗又冷。宿舍负责人对有钱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没有哪天不强调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能使我们得以住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并为我们提供可口饭菜的人。

我本来希望自己到美国之后，再不像过去那么孤僻，可这一希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在宿舍里，无论我多么注意不冒犯别人，其他孩子还是有意回避我，或是欺负我。因为在他们眼中，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外人”。他们常常恶作剧，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之所以感到特别孤独和与世隔绝，还因为我的亲戚和熟人来寄宿学校时，只去见教养人员，却对我不闻不问。